二十一世紀評論

革命憂思錄

舊制度與大革命

——通往自由之路？

Robert T. Gannett Jr.

通過向他的同事推薦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王歧山將托克維爾筆下為自由付出的高昂代價轉換為中共為專制主義付出的沉重代價，因為在中共的所有現代化方案中，中共領導人一直固守着絕對權力和一黨統治。

閱讀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以下簡稱《舊制度》)，讀者會立即為著作家雄辯的解說深深折服。托克維爾的身影可以說貫穿整部《舊制度》，他對導致法國於1789年爆發大革命並最終墮入暴政的諸多原因做了極為精彩的揭示。與此同時，他在1853年撰寫該書時即指出，自由本來可能、應當且能夠成為大革命的主要遺產。作為一位研究檔案的內行專家和自由鬥士，托克維爾提請他的每一位讀者回答其偉大著作中提出的如下重大疑問：自由的代價是甚麼？為此我們應當採取怎樣的行動，即便那可能意味着與專制主義的歷史潮流迎面遭遇？

最近傳聞新一屆 (所謂「第五代」) 中共領導集體開始將托克維爾作為他們的導師，促使《舊制度》在華夏大地迅即成為暢銷書。2011年9月，後來成為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訪問牛津大學，就中共上層的處境以托克維爾式的口吻極具說服力地問道：「我們可以一下子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嗎？」據說王當時談到他閱讀《舊制度》的體會和引述鄧小平的話，對當時在座各位這樣提問。他接着自問自答：「難。我們恐怕還沒有吃夠苦頭，付出足夠的代價。簡單說，我們的路子還很漫長。」①通過向他的同事推薦閱讀《舊制度》，王將托克維爾筆下為自由付出的高昂代價轉換為中共為專制主義付出的沉重代價，因為在中共的所有現代化方案中，中共領導人一直固守着絕對權力和一黨統治。

看起來王歧山的確找對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可能、應當且能夠成為力圖準確把握中國革命與自由之關係的中國讀者的合適指南。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六十四年，托克維爾才開始寫作《舊制度》，但他的視角獨特而不失客觀；同樣，中國人在1949年革命之後六十四年，也獲得了他們自己獨特且客觀的觀察視角。在《舊制度》前言，托克維爾這樣寫道，「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

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②中國人也發現，1949年的中共也力圖實現其激進的革命決裂。托克維爾當時試圖分析造成法國這種斷裂背後的動力、革命領袖宣稱的「另起爐灶」(tabula rasa)，以及之後六十多年裏他們的繼承者製造的一整套旨在貶抑自由的革命敘事。而中國人所發現的不僅包括他們自己的革命動因，而且包括革命領袖的浮誇承諾、標榜的「另起爐灶」，以及旨在為一小撮精英先鋒隊的統治辯護且影響深遠的凱旋式敘事。《舊制度》在消解法國式的「另起爐灶」和凱旋式敘事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如托克維爾所指出，無論如何，法國人的民族特性、傳統民情習慣以及政治和社會結構在大革命之後一仍其舊。如今，中國的讀者可以借助托克維爾的視角質疑他們自己國家的「另起爐灶」和精英敘事，從而探索他們自己的通往自由之路，這種自由將是一種有着真正的「中國特色」的自由。

《舊制度與大革命》有可能成為中國人通向自由的指南

《舊制度》在消解法國式的「另起爐灶」和凱旋式敘事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如今，中國的讀者可以借助托克維爾的視角質疑他們自己國家的「另起爐灶」和精英敘事，從而探索他們自己的通往自由之路，這種自由將是一種有着真正的「中國特色」的自由。

本文在遵循托克維爾著述意圖的同時，力圖向中國讀者揭示閱讀《舊制度》的一種方法，以及為何中國人可以將此書作為他們通向自由的指南。在對自由與平等之間由來已久的微妙平衡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將聚焦於托克維爾文本中的三個教誨，在他看來，這些教誨是任何經歷過革命的持續衝擊的民族——無論是法國(1789)、中國(1949)，還是美利堅合眾國(1776)——在力圖實現自由的過程中必然面對的核心挑戰：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具有政治實踐經驗的公民；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時刻警惕不切實際的空想家及其充滿誘惑的方案；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具有某種基於信仰和精神克制而非金錢和泛濫物欲的道德觀。筆者將在結論中指出，托克維爾對他的祖國發生的革命所持的顛覆性立場，能夠為中國人思考關於他們自己的革命提供現成樣板。作為不滿現狀但又不想重蹈覆轍的務實的激進主義者，當今的中國人不得不想方設法——無論是以知性的、政治的、法律的，還是對抗性的手段——挑戰任何形式的專制制度，即便可能需要為自由的最終實現付出高昂代價。

一　托克維爾作為自由的嚮導

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圍繞自由與平等的雙重性這一軸心展開。對任何「想真正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借用王岐山為中共立下的宏願)的民族來說，必須不

遺餘力同時實現自由和平等，保持兩者間脆弱且不穩定的平衡，這種平衡由於收入差距、族群分野、國家壟斷、官員腐敗，以及黨派歧見而變得空前複雜。擴大平等，必然意味着通過稅收政策和選擇性的政府干預限制自由；伸張自由，必然意味着減少政府干預，更為充分地發揮個人的才幹、創造力和首創精神，這就造成潛在的不平等後果。無論是作為行動領域的立功者，還是作為思想領域的立言者，托克維爾畢其一生，結合個人的遊歷和通過比較分析，探索自由與平等在法國的平衡點③。

在《舊制度》一書中，托克維爾揭示了法國大革命爆發伊始，曾在一個令人興奮的短暫瞬間實現了自由與平等的平衡。在該書最後一章，托克維爾寫道：「那時，法國人對他們的事業和他們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們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④「這兩種激情都同樣真誠強烈。大革命開始了，兩種激情碰到一起；它們混合起來，暫時融為一體，在接觸中互相砥礪，而且最終點燃了整個法蘭西的心。」⑤然而，根據托克維爾的經歷，革命往往產生暴民、混亂、各種無法預測的後果，以及導致蠱惑人心的暴君的崛起。面對混亂，由於缺乏實現自由的有效手段，1789年的法國人很快便「拋開他們的第二個目的(自由)，回到第一個目的(平等)」⑥。他們在一個強有力專制統治者之下不斷尋找平等，在托克維爾時代即順理成章地投入拿破崙這樣的主人的懷抱。與所有專制者一樣，這樣的主人即便在處心積慮地使自由徒有其表的時候，也不斷向所有公民許諾平等以及至少是表面的自由。

為了防止自由遭到厄運，托克維爾指出，一個民族必須擁有具有行動能力的公民，抵制那些文學空想家和陰謀家的蠱惑；必須具有某種道德觀，從而使人們將自我與他人的利益聯繫起來共同行動，追求和捍衛他們的利益和權利。

為了防止自由遭此厄運，托克維爾指出，一個民族必須擁有具有行動能力的公民，抵制那些文學空想家和陰謀家的蠱惑；必須具有某種道德觀，從而使人們將自我與他人的利益聯繫起來共同行動，追求和捍衛他們的利益和權利。

(一) 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具有行動能力的公民

在《舊制度》一書的前言中，托克維爾即指出：「不少人可能會指責我在本書中表達了一種對自由的完全不合時宜的酷愛，他們要我相信，在法國再沒有人在關心甚麼自由。」⑦

在書中，托克維爾提出了三個關於自由的主張。第一個主張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這可以追溯到他早先的另一部巨著《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在《舊制度》一書的前言中，托克維爾重申他的如下卓見：即現代人表現出明顯的個人主義，一心專注於自己的私人財產，諸如此類的傾向促使人們彼此分離、軟弱無能，而這正是那些精明的專制者所樂見的。為此，托克維爾強調指出⑧：

> 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

公民社會正是這種匿名的、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的「解毒劑」，它是促使人們彼此建立紐帶的關鍵——志願者協會、小型民間協會、地方村落和鄉鎮議事會、政治協會以及各種行動組織，能夠督促公職人員解決諸如空氣或水資源污染、防止以公共名義侵奪私人財產、消除隨處可見的腐敗行為等問題。這樣的協會組織不是由暴民組成的。居民集會，擬訂計劃，鄰里之間彼此溝通，採取行動，評估行動的效果……舉一反三，直至和那些與他們打交道的政府官員一道使問題得到解決。

托克維爾關於自由的第二個主張是歷史性的，尤其是涉及到他所稱的「政治的」或「地方的」或「第二位」的自由，即數百年來聯繫法國城鄉居民的地方鄉鎮和村落居民議事會。在《舊制度》第二、三編中，托克維爾揭示了那些促使法國大革命突然爆發的動力：地方貴族從鄉村遷往巴黎、農民對封建剝削的深惡痛絕、中央政府對地方村民議事會的滲透和吸納及其對地方民眾管理本地事務的嗤之以鼻、中央政府操縱稅收政策使之有利於某些階級、行政法規和程序朝令夕改、對文學政治的普遍迷戀。作為托克維爾歷史敘述的一部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本來可以通過在社區內強化公民的行動能力而得以矯正，除非出現如下狀況：「當大革命突然來臨時，要想在法國最廣大的地區找到十個慣於以正規方式共同行動、進行自衛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權獨當此任。」⑨唯有自由可以通過中間協會組織填補鄉村留下的真空；唯有自由可以促使人們超越宗教、階級、族群、經濟以及利益的界限，將他們的自利與鄰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唯有自由可以讓公民抵制權力的傲慢和專斷，防止地方和國家層面政治精英的腐敗；唯有自由能夠使公民抵禦那種虛幻的革命式決裂和「另起爐灶」。

托克維爾指出，包括法國大革命的締造者在內的歷史上那些偉大的自由鬥士之所以願意為自由付出代價，是因為他們熱愛自由乃出於自由本身的魅力，即「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

托克維爾關於自由的第三個主張是規勸式的。托克維爾告訴讀者：「不要叫我去分析這種〔對自由的〕崇高的志趣，必須親身體味。它自動進入上帝準備好接受這種愛好的偉大心靈中，它填滿這些心靈，使它們燃燒發光。」⑩可以肯定，不同的民族對政治自由的激情往往表現各異：一些民族將自由作為幸福的前提，而另一些民族則僅僅沉溺於專制體制所帶來的物質好處和額外的機會。自由所特有的魅力或許只能吸引一小撮有着偉大心靈的公民，尤其是當它與有着更為廣泛吸引力的平等比較時更是這樣。托克維爾指出，包括法國大革命的締造者在內的歷史上那些偉大的自由鬥士之所以願意為自由付出代價，是因為他們熱愛自由乃出於自由本身的魅力，即「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⑪。托克維爾呼喚自由，他首先從正面激發人們的自豪和自尊；發現未果之後，他轉而訴諸人們負面的羞辱感，從而闡明自己的觀點：「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⑫

(二) 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警惕不切實際的空想家

在《舊制度》第三編第一章中，托克維爾戳穿了大革命前夕那些被他稱為「抽象的文學政治」的實踐者⑬：

>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任何障礙；對於必然伴隨着最必要的革命而帶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托克維爾發現，這些文人巧舌如簧，聲言他們所倡導的天翻地覆的變革將會把幾百年來的積弊一掃淨盡。他們的方案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他們總是仰賴中央政府的偉大智慧和善意，認為它能預見一切、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並控制一切……

如今，中國的微博用戶超過兩億，這有助於繞過新聞檢查，打破政府壟斷。但它是在消解文學政治還是在製造一種新版的文學政治？托克維爾如果健在，相信他會認為微博是一種幫助強化公民能力、抵制專制的最佳溝通工具。

在托克維爾看來，中國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學政治傳統：清王朝的統治表現為一種浸淫着文學原則的絕對主權，它借助一個貴族精英階層，向民眾灌輸哲學，而非讓他們親身體驗。清帝國版的開明專制體制在1750年代一度成為法國的效仿對象，當時法國的重農學派經濟學家將之奉為法蘭西國家的典範。托克維爾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⑭。文學政治曾賦予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專制主義色彩，在1949年的中國革命再次沉渣泛起，毛澤東關於文學政治和「另起爐灶」曾有如下豪言壯語：「我們的新中國就如同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與此同時，毛不無危險地認定，中國人民「一窮二白」，可以聽任那些聰明的領導人任意擺布⑮。在1958至61年災難性的大躍進、大饑荒時期，毛的這一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文學式胡謅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大約有1,600至4,500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至今中共權力精英已經花了三十五年的時間消除毛的這一惡劣影響⑯，中共領導人不無自豪地宣稱，他們的改革採取的是一種基於經驗和評估的更加謹慎、注重實踐的實用主義策略，即所謂「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信條。

如今，中國的微博用戶超過兩億，這有助於繞過新聞檢查，打破政府壟斷。但它是在消解文學政治還是在製造一種新版的文學政治？托克維爾如果健在，相信他會認為微博是一種幫助強化公民能力、抵制專制的最佳溝通工具。然而，要最終實現自由，中國新一代公民也必須「摸着石頭過河」，建立一個由各種協會組織構成的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它不僅表現為網上交流，而且意味着成員的積極參與，通過直接、耐心且親力親為的努力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而且在必要的時候當面質詢他們的統治者⑰。

(三) 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具有某種立基於品格而非金錢之上的道德觀

托克維爾發現，專制統治者致力於使其治下的民眾彼此分離、互不相屬。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

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冰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⑱。

托克維爾將人們健康的靈魂視為任何國家力圖實現自由的前提。使人的靈魂保持健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為專制制度時刻在凍結人的靈魂，而專制制度的秘密盟友——金錢——則往往貶低人的靈魂。隨着階級、種姓、官—民界線日趨式微，金錢日益成為後貴族社會的主宰，攢錢成為人們之間彼此分離、相互競爭，顯示自己高人一等的新手段。「在這類社會中，沒有甚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托克維爾在《舊制度》的前言中這樣寫道⑲：

> 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

在這一新社會，為何靈魂遭到戕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政策彼此結盟，壟斷公共領域，將一切決策裹罩在隱秘和黑暗的帷幕之下，使人的靈魂凍結、分離、禁閉，這些政治決策使個人的創造精神趨於懈怠，敗壞公共精神，助長貪婪之心，鼓勵投機取巧。

托克維爾在他的法國同胞面前呈現了這樣一幅圖景：革命走向錯亂，民眾陷入奴役。托克維爾通過他的著作促使法國人反省他們為理想的敗壞和自由的喪失所付出的代價。歷史向我們證明，法國人以某種令《舊制度》的作者感到驚訝的方式對這一代價做了反省。

借用托克維爾的視角，只要公民在身心兩方面依然彼此分離，王岐山心目中的中共治下之「最好的國家」將無由實現。這一雙重的分離得到了中共龐大的維穩機器的強化，使人們的精神世界嚴重失衡。在沒有機會參與志願協會的情況下，人們沒有能力獲得信心、自我價值感以及對自我影響力的充分自信。在喪失了各種文化的偉大精神教養——無論是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猶太教——的情況下，人們便無從認識到自律和克制的重要性。「正確理解的自由」能夠使人們把對無限視界的渴望與自覺的邊界意識結合起來，而志願協會正是培育自由的最好學校。

二　結論

仔細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的讀者將會發現，作者對於革命在建構自由國家中所起的作用深感糾結：一方面，托克維爾擔憂暴民和混亂導致那些力圖建立專制統治的強人煽動民粹情緒；另一方面，他卻將革命視為「初級學校」，在那裏公民將學會把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與審慎的自我克制結合起來的必要技巧。實際上，革命這個「初級學校」可能是走向激發和兑現志願協會這個「高級學校」的唯一途徑，後者正是公民社會實現自由的必要前提。

對世界任何民族來說，最大的挑戰莫過於通過革命走向自由。法國大革命爆發六十四年後，托克維爾發現這場革命在這方面終歸失敗。托克維爾為他的

法國同胞痛心疾首，他在身心兩方面與他們格格不入，《舊制度》對法國大革命當初構想的宏偉藍圖與其遠為有限的成就作出了極具顛覆性的描述。托克維爾在他的法國同胞面前呈現了這樣一幅圖景：革命走向錯亂，民眾陷入奴役。托克維爾通過他的著作促使法國人反省他們為理想的敗壞和自由的喪失所付出的代價。歷史向我們證明，法國人以某種令《舊制度》的作者感到驚訝的方式對這一代價做了反省。在1859年托克維爾去世之後，法國人將他奉為「自由派的已故開山者」，並將他的著作視為法國人逐步實現自由的指南⑳。

雖然新一屆中共權力精英主動將目光投向托克維爾的《舊制度》，但卻對該書所呈現的諸多教訓茫然不知。如今中國人可以在品讀托克維爾著作的同時，消除他們的領導人浮誇的宣言和敍事，尋找他們自己的通往自由之路。

任軍鋒　譯

註釋

①⑮　參見Joseph Fewsmith, "De Tocqueville in Beijing",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9 (Fall 2012): 2; 3。

②⑦⑧⑱⑲　〈前言〉，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29；34；35-36；35；35。

③　有關托克維爾在美利堅合眾國的遊歷以及關於新英格蘭鄉鎮地方自由的比較分析，參見任軍鋒：《民德與民治：鄉鎮與美利堅政治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④⑤⑥⑨⑩⑪⑫⑬⑭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頁244；244；207；242；208；208；208；181；203。

⑯　有關毛澤東的大躍進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後來的中共領導人對之所做的批評以及如何與之劃清界線，參見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0-42, 232-33, 259-60, 355-73, 756, n. 32。

⑰　有關中國村級治理在這方面所做的嘗試，參見Robert T. Gannett Jr., "Village-by-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What Seeds for Freedom?", 15 April 2009, www.aei.org/papers/society-and-culture/village-by-village-democracy-in-china/。

⑳　Françoise Mé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trans. Beth G. Raps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112-48.

甘儒彬（Robert T. Gannett Jr.）　托克維爾專家。畢業於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英語語言文學系，後於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就讀碩士、博士。現任芝加哥社區賦能協會（Institute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主席。